

# 1933 年《申报》读者关于农村出路问题的论战始末

秦韶华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1933 年 4 月间,《申报》爆发了关于“农村回得去吗”的激烈论战。与其他论战迥异的是,此次论战参与者主体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民众。农业恐慌、城市失业严重的双重困境是论战的主要诱因。论战焦点由农村破产的原因到解决的方案不断深化转移,并聚焦在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变革上。最终,认为“农村回不去”并寻求根本改变的看法明显占得上风,反映了一般民众趋于激进的心理状态。其间,对乡村建设运动的尖锐批评,也揭示了乡村建设运动先天的实践困境;论战中被广泛采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接受程度。

**【关键词】**申报;农村;论战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6-0101-10

## The Debate of the Way out of Rural on *Shen bao*

QIN Shao-hua

(School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Abstract:** In April 1933, the debate of "the rural can back to or not" on *Shen bao* broke out. Different with other controversy, main body of the debate participant are not intellectual, but ordinary people. The panic of agriculture and the unemployment of urban a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controversy. The focus of debate transferred from the cause of the rural economy bankruptcy to the solution, and finally focused on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social system. In the end, the view of "the rural cannot back" and look for fundamental change gain the upper hand, which reflected the more radical psychological trend of the ordinary people. Meantime, the sharp criticism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also reveals inherent practice predicament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the Marxist analysis tool were widely used, which reflected the acceptance of Marxism on the Ordinary people.

**Key words:** *Shen bao*; rural; debate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论战迭出、思潮激荡的时代。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以《东方杂志》《申报》《独立评论》等报刊媒介为载体,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本位文化论战等引起较大反响并产生深刻影响的论战。其中,有关中国乡村发展的论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王先明系统梳理和概述了 20 世纪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中的思想交锋及其理论探索问题,并从乡村社会性质论、乡村社会发展道路论、社会结构与组织等三个方面,对二三十年代乡村问题理论论争进行了深入研究<sup>①</sup>。蒋宝麟对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

[收稿日期] 2016-10-11

[作者简介] 秦韶华(1981- ),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史。

① 王先明:《走近乡村——20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8-168 页。

“西化”色彩的陈序经,与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进行了研究<sup>①</sup>。何爱国对知识分子围绕“如何救济农村”发生的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大论战进行了论述,对比分析了论战双方的主要观点<sup>②</sup>。冯峰研究的是1930年代国难背景下,思想界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论争,并把思想界对农村道路的论争置于其范畴内,介绍了蒋廷黻、梁漱溟、晏阳初、陈序经、胡适等人对于乡村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不同观点以及相近之处<sup>③</sup>。刘荣争对知识分子以《独立评论》为阵地展开的乡村建设论争进行了研究,再现了论争的起始与深入的全过程<sup>④</sup>。郭彩琴则对《东方杂志》上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认知进行了研究,涵盖中国农村危机的表现及其原因、解决农村危机的途径等<sup>⑤</sup>。

上述研究焦点大多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并集中于论战各方观点的剖析,兼及论战的影响。但均忽视了对于普通民众的研究。普通民众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的观点、态度是再现时代面貌、展现历史面相的极好的通道。

本文拟以1933年4月间,《申报》“读者顾问”栏目爆发的关于“农村回得去吗”激烈论战为研究脚本,从中窥探普通民众的观点、心态及思想倾向,并解读其中蕴含的丰富时代信息,权为拾遗补缺之作。

1933年的《申报》正值鼎盛时期,“无论是报纸的内容和报社的经营管理、报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申报》和史量才的名誉度,尤其是《申报》在艰难时局中表现出的‘报格’‘报力’,都已经达到了一份民营报纸及其领导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sup>⑥</sup>。尤其是1932年恢复的“读者顾问”(前为“读者通讯”)栏目,受到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并成为他们发声的重要媒介<sup>⑦</sup>。可以说,《申报》“读者顾问”栏目提供了很好的观察窗口。

## 一、论战背景:农业恐慌、城市失业的双重困境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且导因复杂的农业恐慌。这场恐慌于1931年以突发性态势爆发,此后一直持续到1935年”<sup>⑧</sup>。农业恐慌大爆发具体表现为:土地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持续狂跌,地价低落,农产品输出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村负债和失业人

① 蒋宝麟:《“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

② 何爱国:《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关于三农出路论争的回顾与检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③ 冯 峰:《“国难”与“思想界”——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想论争(1931-1937)》,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毕业论文,第197-203页。

④ 刘荣争:《〈独立评论〉视野下的知识分子与乡村建设论争(1932-1937)》,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第19-49页。

⑤ 郭彩琴:《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向往——〈东方杂志〉(1932-1937)》,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

⑥ 何 晶:《简论鼎盛时期的〈申报〉(1931-1935)》,四川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

⑦ 如读者顾问栏目记者王灵均所言“本栏通信的读者之社会阶层极其复杂,其中有教职员,尤其是小学教师、工人、乡村中的智识份子、大中学校的学生及其毕业生、军人、宗教的信徒、青年店员与其所谓世家子弟、名门闺秀”,因此,“遂把一副千头万绪、纷纭错综的社会关系的交织图,呈现在我的眼底。”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⑧ 王先明:《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8页;也有学者称之为“农业经济的衰落”或“农村危机”,王先明对此予以辨析,本文采用其观点。

数增加,农民陷入极端贫困化等等<sup>①</sup>。虽然对农业恐慌中知识分子建构成分的认识有分歧,但学界普遍认为30年代前期的农业恐慌是真实发生并有案可稽的<sup>②</sup>。农业恐慌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农业人口的逃亡。在江南,农民外出谋生主要是到周围城镇和大都市。如无锡礼社外出谋生的755人中,有569人去外县,占外出总人数的3/4,其中又以去上海的为最多,约400人。其次是苏州,本县则以城区为最多,约100人。北方外出谋生农民则到东北的为最多,西北次之,再其次为本县的其他地方。定县18149人的外出谋生的队伍中,有近一万人去了东北<sup>③</sup>。除了这些因生计问题被迫逃离农村的农民外,农村中的优秀人才选择主动迁移。“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sup>④</sup>

但城市也不是安乐窝,正遭受着严重失业问题的困扰。受世界经济恐慌的爆发以及外国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的影响,民族工商业也很不景气,不少厂商破产倒闭、工人失业。1933年上半年全国约有失业工人1250万<sup>⑤</sup>。“1932-1937年,城市失业人数快速递增,全国失业人口已增至数百万乃至千万,城市为失业阴霾所笼罩。”<sup>⑥</sup>

## 二、论战的发端:一封来自失业者的求助信

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向何处去”成为城市失业群体顾虑重重、萦绕心头的大问题,既然城市无以谋生,那么农村是否是更好的去处呢?1933年4月4日,一封刊登在《申报》上的求助信引发了一场为期一个月之久的激烈论战。署名为“雄声”的读者在信中坦承正遭受着“最时髦的病症——失业”,并已到了绝望之境:“犯法没有胆,自杀也鼓不起勇气”,至于学问与才能,“除了能写这样几个字以外,是一点也没有了”。城市里一面在不断裁员,一面是房租、地捐不断增加,“城市里既然无法生存下去,那末,自然只有回到农村里去,才是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但问题是,雄声本人“是一个十足无产者,在城市里没有生产工具,到农村时也没有活命的技能”,加之农村也处于破产边缘,“整个农村的本身都在无法维持,更何从来安插外来的人?”最后,雄声抛出问题向编者求助,“我二十分的相信,这个问题实在是有很多数的人期待着你们的指示……是不是能回乡村,回乡村时怎样是一种最适当而又最可能的维持生活的方法?”<sup>⑦</sup>

从信中可以感受到雄声的苦闷和无助,这种失衡、绝望的心态不单是个体心理的反映,更是整个失业群体的普遍状态。“正是中国当前青年们一致的现象,这是一个绝大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sup>⑧</sup>。“那是,报刊杂志上几乎每天都有自杀的新闻,失业者自杀已成了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sup>⑨</sup>。”但对此普遍性难题,编者也是一筹莫展,“实在想不出什么方法”,只好把问题转抛给读者,结果一场激烈论战由此而起。

① 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年,第157~158页;王林主编:《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第330~333页;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② 付燕鸿、杨东:《揭示历史真相探求救治之路——“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

③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④ 潘光旦:《说乡土教育》,潘乃谷、潘乃和:《潘光旦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71~378页。

⑤ 上海申报馆:《申报年鉴》,1935年,第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8期,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第894页。

⑥ 谭玉秀:《民国时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912-1949)》,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⑦ 《申报》,1933年4月4日。

⑧ 《申报》,1933年4月18日。

⑨ 谭玉秀:《民国时期城市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912-1949)》,第89页。

此次论战自1933年4月4日起至5月1日止,在近1个月的时间内,编者共收到200余封读者来信,有24封信登载在“读者顾问”栏目。绝大多数来信未能见报<sup>①</sup>。之后,又有14篇未刊来信补录在1933年9月10日王灵均编的《〈申报〉读者顾问集》一书中<sup>②</sup>。民众参与踊跃,大有“不吐不快”之势,这表明面临农业恐慌、城市失业双重困境,焦灼不安的民众迫切需要通过媒介渠道宣泄情绪、表达心声。激烈的论战也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学者、编辑杨幸之等纷纷加入论战,《申报》不得已已在“自由谈”栏目中另辟“第二战场”,与“读者顾问”栏目遥相呼应<sup>③</sup>。

4月5日,针对雄声的来信,乳业专家、农场主尤怀皋第一个作出回应。他建议回到农村去,并抛出三个条件,即“(一)你是否爱好乡村?(二)你是否真心爱你的乡村中的农友?(三)你自问能否坚决任劳在乡村中寻生活?”然后,“用十年的工夫,来建议一个意想中的新式桃花源”。尤怀皋自承,“我是绝对主张乡村教育救国的一个人”,并给出“四步走”的解决方案:施教,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行医卖药,进行村治工作<sup>④</sup>。在乡村建设运动方兴未艾的30年代初,尤怀皋的意见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想通过乡村建设救国救民的良好愿望。

尤的来信甫一登出,就激起了强烈反驳。上海市民刘思民予以坚决驳斥,认为尤关于桃花源的主张具有明显的空想性。“好一个‘新式的桃花源’,好一个‘梦想中的桃花源’,我们尤先生既然梦想着这种‘意想中的新式的桃花源’,为什么自己不去试一试?”继而,旗帜鲜明地批判乡村教育救国论,“乡村教育发达如美国都无法逃脱农村的破产”,中国更是如此<sup>⑤</sup>。

尤怀皋和刘思民针锋相对的观点立即引来其他读者的参与,大家围绕着“农村能否回得去”展开激烈论战。在参与论战的读者中,朱天青、浪仙二人支持尤的观点,石愚、张梅、胡念祖、朱婴、徐先孚、唯明、余曰生、叶梦影、伟浩等九人支持刘的观点,此外,王龙章、章海良、李馥三人对尤、刘的观点均有批评,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

论战者除了尤怀皋本人有史可稽外,其他均为普通民众。关于他们的职业、经历,只能根据来信透漏的些许信息进行推断。尤怀皋是民国时期的乳业专家和牛奶商人,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后在上海创办自由农场,供应消毒牛奶和生菜等,属于资产阶级阶层<sup>⑥</sup>。刘思民,职业不详,是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城市左倾青年<sup>⑦</sup>。石愚、唯明,出身农村,是移民到城市的小职员<sup>⑧</sup>。胡念祖、叶梦影则是刚逃离农村的农民。其他几位论战者可推断为城市居民。论战各方阶层不同、职业各异、城乡背景各殊,使得论争更能立体、全面地呈现当时民众的心态。

① “还有不少讨论函件,内容都很精彩,都已不及披露,我们深感抱歉。将来如有机会仍当另行发表。”《申报》1933年5月1日。

② 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第453~508页。

③ 曹聚仁等人4月24日在“自由谈”栏目里开始论战。但时间短、来信少,本文不作专门研究。

④ 《申报》,1933年4月5日。

⑤ 《申报》,1933年4月7日。

⑥ 杨铨:《杏佛日记》,《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第2期。

⑦ 刘思民批评尤:“老实说罢,尤先生这种思想是目前中国资产阶级对于现实政治的一个真切的反映……自然在另一进步的社会里来,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是要打破这一公例,消灭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从这些明显具有倾向性的话语中,可见刘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另,“记得本文很长,经×××删去许多,大概是因为×××太不×××了,恐怕×××罢”,×××为报纸送审时被删掉的敏感字眼。文章被删更加证明他的激进性。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第292~295页。

⑧ “我现在是一个公司里的小职员……我的家乡却不要知识份子呢……我的家乡是破产了”可为证明。《申报》1933年4月5日。

### 三、论战进程：焦点的转移与深入

自尤怀皋、刘思民各自“亮见”以后，读者围绕着“农村能否回得去”论题展开激烈论战。“桃花源”的主张可行还是空想，是双方论战的第一阵地，结果，反对“桃花源”主张的占据明显上风。农村破产的原因是双方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双方各执一端，都有立证的依据，提供了丰富的时代信息，为继续研究30年代农业恐慌的成因提供了佐证和启示。随着论战的深入，最后双方论战焦点集中在如何解决农业恐慌上，一方坚持乡村教育的渐进式改良道路，另一方则主狂飙突进的革命道路。后者赢得更多支持，但前者也有自己的合理成分。纵观论战的进程，随着焦点的转移和深化，最终触及到应否变革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敏感层面，这种发展趋向与编者“由部分的问题，引导一般的问题，由枝叶问题引导根本的问题”的期望几无二致。论战呈现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与随后知识分子之间爆发的论战有诸多相近之处，某种程度上是后者的一种“预演”<sup>①</sup>。

#### 1.“桃花源”可行还是空想？

对于刘思民的批评，尤在4月8日的回信中，未作正面回应，避实就虚，从精神层面上强调理想和信念的重要性，“我最不欢迎的一句话，就是说人是理想和幻想……水火天空，尚能征服，难道我们衣食出处的乡村就不敢进去么？试问哪一种事实不是从理想中来？”并转而批评是刘的言论是“没志气、没勇气、少智识、缺毅力的人所说的话”<sup>②</sup>。现实层面上，尤以法国乡村牧师吴伯苓(oberlin)和比利时大牺牲家达米(Damiew)的事迹为证，坚持认为建设“桃花源”具有可行性。

尤的回击看似全面充分，但论证苍白。笔名“玄”的读者写道：“劝失业青年回农村去的那些人们，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上是并没有什么错误的，错误的只是他不该专是安坐在舒服的沙发上，不该专是看璇宫艳史，或草裙艳舞之类的，而不略一翻阅满载着农村崩溃情事的中国报章。”<sup>③</sup>讽刺尤对农村崩溃现状的无知。

石愚出身农村，回击格外平实有力。他针对尤“四步走”方案提出严重质疑，首先尤提出的在亲友中筹措一二百元就难以办到。“在我们这些穷措大看来，却是非常巨大的一笔款子啊！”这一看法引起同样来自农村的唯明的共鸣，“尤先生可曾知道，在每个农村中有多少农民终年身边未藏过‘一元’。有多少农家连饲鸡或鸭的粮食也没有……”<sup>④</sup>据30年代上海的《社会月刊》对上海吴兴地区的调查发现，平均每家亏欠126.09元<sup>⑤</sup>。1933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北夏实验区曾对该区所属20个乡镇的农民收支情况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是收不抵支<sup>⑥</sup>。广大农民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筹得如此巨款，确实难以办到。至于施教，在石看来，更是难以想象，“他们(农民)终岁勤劳，尚不能获得一饱，哪里还有什么遗力来估计子女的教育呢？”<sup>⑦</sup>

伟浩则对行医卖药提出质疑，“近两年来，上海的医生过剩，原因却是内地无以谋生而投到上海来的太多，那末，以雄声君对于医药外行的人，到乡村去又有什么把握呢？”<sup>⑧</sup>

① 参见冯峰、刘荣争、郭彩琴等人研究成果。

② 《申报》，1933年4月8日。

③ 《申报》，1933年4月24日。

④ 《申报》，1933年4月16日。

⑤ 《沪西农村的憔悴》，《劳动季报》第8期，转引自《江南近代农村》，第629页。

⑥ 《北夏第二年》(上)，《教育与民众》第6卷第6期。

⑦ 《申报》，1933年4月9日。

⑧ 《申报》，1933年4月19日。



莘庄农场主痴农君现身说法,“我是受一般唱高调回农村去的先生们的惠赐,故所以我未到农村去之前,梦想要到农村去度新生。今已达到失败之地步了!……我是回到农村去过的人,住了有一年余,未赴农村去之前,比尤君之计划,还要胜数倍。再有农村中种种黑暗地狱,外乡人与知识阶级,很难知道内中的黑幕……目下经济不足,不能维持下去,即要宣告破产。”<sup>①</sup>以自身惨痛的经历来证明“桃花源”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尤怀皋是民国时期“农业专家”,但明显不是农民、农村问题的专家。他对中国农村基本状况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导致“此番交手”几无还手之力。虽然4月13日朱天青支持尤建设“新式桃花源”的计划,但只是壮壮声势,对刘提出的现实问题回避不答。4月24日,朱甚至认为“因为在农村里过生活,终究比都市里要容易的多”,这种论调遭到“玄”读者尖锐批评,被指为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历史典故一样荒唐可笑。

## 2. 农村破产原因何在?

论战各方大都认同中国农村趋于破产的客观事实。但对于农村破产的原因却看法各异,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是农民的愚昧。尤怀皋认为,“最痛心的就是农民一代一代的没有教育,倘然有了教育,决不致天灾人祸闹个不休,也不致目前的如此束手无策……据我个人看来,中国当前的大敌,倒不单单是日本的侵略是问题,还有三万数千万农民的愚昧也是问题。打破这愚昧的工作,恐怕要比较战胜日本还要难到百十倍。”<sup>②</sup>朱天青同样认为,“因为农村教育不发达的缘故,于是一般农民对于耕种上不晓得改良……假使中国乡村教育发达的话,那么中国的农业早已兴盛。”<sup>③</sup>1920年8月,晏阳初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立即开始在国内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19省市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民情,发现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尤、朱的观点如出一辙,明显深受晏阳初的影响。

二是帝国主义侵略。针对尤的观点,刘思民、胡念祖、石愚等纷纷提出异议,并一致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才是根本原因。刘思民认为,“农村之所以破产,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军阀内战,苛捐杂税等等。”<sup>④</sup>胡念祖认为,“因为我刚是个从农村来的乡下佬……但最大的根本原因,则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侵入农村,提高了农村生活的程度,同时农产物的价格,相对的减少,尤以最近一两年来为著。”<sup>⑤</sup>石愚、张梅同样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据郑大华研究,30年代初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农产品以转嫁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侵略是造成农村经济衰落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sup>⑥</sup>

三是社会制度。刘思民更进一步认为:“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之下,梦想着以农村教育来救国,救济农村,那也只有傻子才会相信。”目标直指现行社会制度。叶梦影明确提出,“其实在的原因,还在现社会的制度的关系上,因为现制度不好,才造成军阀的内战,军阀的内战才造成农村的教育的不发达,农村教育的不发达,农民才不知道改良种子和器具。”<sup>⑦</sup>把农村教育的不发达作为结果而不是原因来看待。

尤怀皋、朱天青持第一种观点,刘思民一派则持第二、第三种观点,并对尤的观点猛烈攻击。刘批

① 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第483~487页。

② 《申报》,1933年4月8日。

③ 《申报》,1933年4月13日。

④ 《申报》,1933年4月12日。

⑤ 《申报》,1933年4月14日。

⑥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38页。

⑦ 《申报》,1933年4月23日。

评说：“尤先生并没有丝毫了解中国农村破产与农民的痛苦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升级，“实则这种说教，就是反帝运动、抗日运动的阵营中一种最巧妙的敌对的宣传，这种行动，至少是逃兵、落伍的勾当！”<sup>①</sup>刘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开始把论战提到敏感的爱国高度，试图占领“爱国主义”的道德高地压倒对方。

客观而论，两派提出的问题都是造成农村恐慌的原因之一。但何者为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双方争执的焦点，并各不相让，因为这是他们提出解决方法的立论基石。把问题逐步引向并归结于社会制度，显现了论战的激烈程度和寻求根本解决的迫切心态。

### 3. 如何解决农村问题？

对于农村破产的原因，各方无法达成一致，但论战各方均提出自己的思路去解决之。尤怀皋率先提出自己的主张，即改良式的乡村教育。“我是绝对主张乡村教育救国的一个人”<sup>②</sup>，甚至提出，“我不但要劝有心回到农村里去的雄声君到乡村去建设，我并且竭力劝告全国大中学生，毕业以后，每人费一年的工夫，替国家来建设农村。”<sup>③</sup>尤不仅是乡村建设的提倡者，更是实行者。1932年12月23日起，他曾连续15天在《申报》刊载“敬告全国大中学生实行教育救国”全文，大声疾呼“因为中国穷的问题，不在肚饥，而在脑荒，所以解决脑的问题，就是根本上解决肚的问题，外国人的富，富于脑，他们的强，亦强于脑。所以，我们当认定脑是富强的泉源，所以我们能解决脑的问题，一切问题都解决了。”<sup>④</sup>后，该文印刷一万份，分送全国教育界。“我在龙华新场上，设立一个训练乡村师资及农工领袖的机关，秋间就要成立……在苏州本乡也要设立一个乡村小学。近来又资助一人在北新泾陈更村设立一个乡村小学。”<sup>⑤</sup>可见，尤怀皋是相信并热心推进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方案得到了朱天青的支持。“假使中国乡村教育发达的话，那么中国的农业早已兴盛，而不像现在那么的萎顿。”<sup>⑥</sup>

对于尤的主张，刘思民等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尤的主张解决的是枝节问题，而不是根本问题。尤其是回避当时尖锐的土地问题和政治问题，“教育是不能脱离政治关系的，脱离政治的关系去办教育，绝对不可能，结果只有失败”，“因为他的农村教育若能办得真真有成绩，农民子弟一定不是那些驯服的羔羊，一定不会不与地方上绅士官府发生冲突，结果只有失败。”<sup>⑦</sup>

“读者顾问”栏目没有介绍刘思民的方案。根据前文揣测，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审查的原因，未能见报。正如编者所言“而怎样去解除这不能回去的原因，则他们并没有积极建设，就有话说，也很隐晦。”<sup>⑧</sup>但从“那就没有比法国大革命还好的教育，没有比俄国革命还好的教育！”<sup>⑨</sup>一语中，他的解决方案呼之欲出，那就是倡导革命的激进模式，改变社会制度，“毕其功于一役”。

与刘持同样激进态度的大有人在。未获刊载的胡念祖来信，讲得更加直接，“所以我们应当以反抗苛捐杂税、打倒贪污土劣为号召，激发农民的革命情绪，同时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醒士兵的爱国热忱使之反抗内战，更进而建立真正的民主主义政权，直接与帝国主义相肉搏。”<sup>⑩</sup>叶梦影更加激

①《申报》，1933年4月12日。

②《申报》，1933年4月5日。

③《申报》，1933年4月8日。

④《申报》，1933年1月13日。

⑤《申报》，1933年4月8日。

⑥《申报》，1933年4月13日。

⑦《申报》，1933年4月12日。

⑧《申报》，1933年5月1日。

⑨《申报》，1933年4月12日。

⑩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第455页。

烈,“而是需要我们脱下长衣和西装带革命的导火药到农村里去!把朽腐的吃人的旧的农村制度炸毁,代以合理的新的农村制度。”<sup>①</sup>

#### 四、寻求出路、亟待变革的心理倾向

5月1日,《申报》“读者顾问栏”刊载了尤怀皋的最后一封来信,并不无惋惜地中止了此次论战。“我们本打算将这问题讨论出一个结果,可是因为时间已经延到这么久,还有其他许多重要函件急待发表,不得不就此半途宣告结束”。几乎同时,4月30日,在“自由谈”栏目的第二战场里,曹聚仁与杨幸之等人的论战也戛然而止。

基于《申报》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和覆盖面,以及此次论战读者参与的广泛性与多元性,我们得以观察时人一般的心理趋向。近1个月的论争由一封求助信触发,但1930年代农村经济恐慌才是孕育论战的土壤,随着论争的逐渐深入和论题转移,最终不可避免地回落在“如何根本解决农村问题”这一核心议题上。如编者在附言中所言:“其实这就是中国整个的出路问题。”<sup>②</sup>对此,以尤怀皋、刘思民为代表的论战双方分别开出了改良式的乡村教育、激进的革命道路两种截然不同的“药方”。结果,前者明显处于劣势,而支持刘思民观点的读者则远胜于尤。刘思民等基于对农村现状的深刻认识,辅以石愚、胡念祖、南京唯明等人的现身说法,提出的方案说服力很强。反观尤,虽是满腔热情地推进乡村教育,但在普遍激进的心理趋向下,他渐进式的乡村教育方案,不被理解,难以赢得认同。

##### 1. 面对困境,祈盼出路成为普遍心态

在农村恐慌、城市失业的双重困境下,出现了破产农民赶往城市,城市失业人员无处谋生、向往农村的矛盾场景。城市失业人员教育程度较破产农民为高,能够透过报刊袒露心声,但农民的处境更苦,因教育程度低下,无法发声,而成为“沉默”的群体。他们的困苦情形通过出身农村、工作于城市的“新市民”得以折射,如石愚、胡念祖、南京唯明等读者在来信中,无一不对农村的艰苦情形有生动描述。在民生之困遍及城乡的背景下,时人的心态明显局促不安,但面对无法回避但又无法破解的困境,郁积成论战的力量,围绕着议题得以迸发。

##### 2. 亟待彻底变革、根本解决成为普遍的思想倾向

在列强经济侵略、日本武装进逼、国内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寻求根本解决思想倾向成为主流。民众对于尤怀皋“用十年的工夫,来建议一个意想中的新式桃花源”的主张,明显等不及,“用十年的工夫去试一试?关起门来,做他的好梦,享他的清福,即使日本军队打了来,或是什么地方的赤匪打了来,也不会光顾到他:因为……尤先生的‘意想中的新式的桃花源’,一定‘不知有周秦,遑论中华民国’……”<sup>③</sup>在国难临头的当口,从长计议去搞慢悠悠的乡村教育被扣上“为自己作理想文章”<sup>④</sup>的大帽子,显得不合时宜。除了朱天青一人予以支持外,无人响应。在“自由谈”栏目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有曹聚仁一人坚持改良式的乡村建设运动。

刘思民等的革命主张则赢得广泛认同。“这就是现社会崩溃的开始,也就是未来的新社会的晨曦。”<sup>⑤</sup>胡念祖在未刊来信中,直言“但是××党为什么又能够在各地取得农民拥护呢?这与其说是××党有什么麻醉的农民的领导,毋宁说是××党离开农民的结果。因为农民的骚动是客观上现成

① 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第469页。

② 《申报》,1933年5月1日。

③ 《申报》,1933年4月7日。

④ 《申报》,1933年4月19日。

⑤ 《申报》,1933年4月23日。



的摆在社会上的革命材料。”<sup>①</sup>抨击国民党失败的农村政策,并为共产党的“骚动”进行辩护,政治姿态鲜明。

除对阵双方外,编者的态度也值得关注。作为论战的组织者和观察员,他理应保持严格的中立,但他“由部分问题引导一般问题、由枝叶问题引导根本问题”的建议,却不经意间把天平倒向刘思民一边,并隐晦地引导读者“我们第一步先问现在中国的农村能不能回去?答案是不可能,不能回去的根本原因何在?则一班读者已经替我详细指出。那末,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不能回去的根本原因除去,农村自然就可以回去。”<sup>②</sup>这种半隐的倾向性语言也是时人激进心态的另一个有力注脚。

## 五、关于论战的两点思考

除了民众日趋激进的心理趋向外,论战中传递了丰富的时代信息,对于我们理解乡村建设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的传播,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

第一,乡村建设运动先天的实践困境。乡村教育运动大约形成于1926年前后。1927年左右,开始向乡村建设运动方向发展。1931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首次使用“乡村建设”一词。随后,乡村建设的口号响彻全国,进入大张旗鼓推进的兴起阶段。但通过论战,乡村建设运动暴露以下弊端。一是乡村建设运动“精英”领导对乡村现状的认知先天不足。尤怀皋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虽然精通农业,具有国外教育背景,并且对推进乡村教育充满热忱,但明显对农村现状处于茫然的空想状态,对于他将来乡村建设成效可想而知。尤怀皋并不是个例。在“深入民间”口号的带动下,“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抛弃了他们在城市的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各方面都比较艰苦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工作。”<sup>③</sup>他们的真诚与热情无可否认,但是先天对农村现状、农村生活隔膜。可以想象这些精英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会有怎样的成效。晏阳初在《农民抗战与平教运动之溯源》一文中写道:“有的人虽然为一时意义所冲动,参加农村工作,但不到三年五载,就退出了。”二是乡村建设运动未能回应农民的真正关切。刘思民等人的来信中,提出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土地兼并等严重问题,在尤怀皋等人的乡村教育方案中几乎没有体现,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局部的、枝节的,没有触及任何现行政治制度、土地制度,没有真正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自然也就无法充分动员、组织农民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并最终导致出现梁漱溟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农村不动”的难局。

第二,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被普通民众所认可,成为“批判的武器”。20世纪30年代初,因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对比的影响,在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华经济掠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再度高涨。形成了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波社会主义传播的高潮。借用胡适晚年的话,谈论社会主义,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在30年代初成了一种时髦<sup>④</sup>。纵观论战,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思潮在民间形成了较大的传播效应,被普通民众接受和认可,并熟练地运用到论战中。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刘思民建议说,“先生,我们研究一个社会问题,尤其是一个极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要分清什么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什么是它的物质基础,什么是它的上层建筑。”<sup>⑤</sup>石愚同样认为,“不过我觉得社会的组织是根本基于经济,经济无办法,政

① 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第455页。

② 《申报》,1933年5月1日。

③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第539页。

④ 郑大华、谭庆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申报》,1933年4月17日。

治必紊乱,在贫乏的经济和紊乱的政治之下,一切建设都是空谈!”<sup>①</sup>再如,经济制度的私有问题。叶梦影认为,“军阀所以内讧,完全是基于社会制度私有的关系上,如社会制度并不是私的,那末个人的利禄心就会消灭,个人的利禄心消灭,当然没有地盘主义、英雄思想,那末也不致产生军阀,更无所谓‘内讧’。”<sup>②</sup>随之而来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伟浩认为,“然而自从资本主义到了中国毒入农村之后,不但城市中缺的,不必仰给于农村,就是目前的农村,正也给资本主义搞得不成样儿了哩。”<sup>③</sup>

“如果说 20 年代人们将马克思主义还视为‘洪水猛兽’,30 年代人们则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到了 40 年代人们则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认同马克思主义了。”<sup>④</sup>纵观这次围绕农村是否回得去的论争,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类似现象同样出现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参加论战的学者,纷纷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sup>⑤</sup>由此我们发现,无论精英的知识阶层还是当时一般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倾向已在潜滋暗长,再加之日趋激进、寻求彻底变革的心理倾向,民意慢慢汇聚成无法阻挡的奔涌河流,最终,推挪着国家未来的走向。

### [参 考 文 献]

[1] 王先明.走近乡村——20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2] 朱其华.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M]. 上海:中国研究书店,1936.

[3] 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 16[Z].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

[4]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杂志社版权页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社上述声明。

①《申报》,1933 年 4 月 9 日。

②上海图书馆整理:《申报丛书》16,第 460-461 页。

③《申报》,1933 年 4 月 19 日。

④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95 页。

⑤李 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2 期。